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四一〇期 ——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412d)

---

【千古之谜】再探“571工程”之谜 林彪身边有毛泽东耳目?	舒 云
【史料辨析】谁掌握了破解林案的钥匙?	史 学
【各抒己见】难得糊涂,呼唤清醒 ——评朱学渊先生《一堆糊涂虫说林彪》	云 衡
【史海钩沉】周恩来与“反英抗暴斗争”	余长更
【往事如烟】重庆文革口述史——黄廉访谈录(六)	老 田

---

小启: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 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 <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mailto: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 【千古之谜】

(编者评语: 本文探讨的“林彪身边有毛泽东耳目?”的问题, 在李志绥医生的回忆录中可以找到答案的蛛丝马迹。据丁抒所撰“进入中共中央核心的译电员”一文(载本刊zk0005a)所述:“李志绥的回忆录里有这么一段:‘到一九七一年八月时, 毛对林彪的不信任达到极点。清华大学革委会副主任谢静宜的丈夫小苏(作者注: 苏延勋)在空军党委办公室工作, 通过谢传来消息: 林立果在空军成立了秘密组织, 包括‘联合舰队’、‘上海小组’和‘教导队’, 在做武装夺权的准备。小苏要毛注意。毛决心南巡, 乘南巡的机会和大军区的领导人及省的领导人打招呼。’九月, 发生‘九·一三事件’, 林彪派系被清除, 谢静宜为毛立了功。一九七三年中共召开“十大”, 谢静宜当上了中央委员, 还兼了个北京市委书记。”看来, 苏延勋就是这样的耳目之一。)

再探“571工程”之谜 林彪身边有毛泽东耳目?

• 舒 云 •

九一三事件过去30多年了, 仍疑点重重。毛泽东南巡与九一三事件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 为什么林立果的“三个方案”(上策在杭州、上海谋杀毛泽东, 中策南飞广州, 下策北飞苏联)

每一个都没有展开，就被毛泽东粉碎？如果没有千里眼顺风耳，毛泽东凭什么料敌如神？本文根据目击者的回忆，试图剥离出历史的真相。

1971年9月12日13时10分，毛泽东的专列秘密停靠在北京丰台车站。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非常吃惊，怎么不声不响就回来了？原来计划不是这样的呀？周恩来的卫士长高振普回忆，9月12日17时，总理起床，睡够了6小时，特别精神。一直等候的杨德中（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政委）跟着总理进了卫生间，报告主席回来了。总理问，怎么这么快就到了丰台（知道毛泽东离开上海）？杨德中说，除了加水，一路上基本没停。总理又问，专列什么时候进的北京？杨德中说还不清楚。

九一三事件后，林豆豆（林彪女儿）和未婚夫张清霖被关在玉泉山写揭发材料。专案组曾追问他们，林立果（林彪儿子）为什么要跑？林豆豆说，听说主席在南方打招呼，要搞首长。周恩来说，根本没有这回事，他不知道。

他真的不知道吗？周恩来虽然一直在北京，但他知道毛泽东南巡的讲话内容。9月4日，汪东兴曾将他和华国锋追记、经毛泽东改过的南巡谈话稿（8月16日至27日毛泽东在武汉同湖北、河南、湖南等负责人的谈话）专送周恩来。主要内容讲述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揭露黄吴叶李邱以及背后的林彪在庐山会议上搞突然袭击，分裂党、急于夺权的阴谋。

9月11日，周恩来和回到北京的华国锋谈话，更是完全了解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难道身经百战的他没有意识到“大战”将临吗？如果他意识到了，为什么对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如此吃惊呢？

因为毛泽东离开上海，不一定马上回北京，路上还可能停留几个大城市，比如南京，比如济南，比如天津。本来毛泽东到北京还会晚一些时间，据张耀祠（中央警卫团团长）回忆，毛泽东准备召见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汪东兴打电话一问，杨得志下部队了，于是专列直接“杀”回北京。

汪东兴（中央办公厅主任）介绍，毛主席身体健康时，每年都要外出巡视。国庆节前出巡已经成了规律，一般在9月25日左右返程。可今后怎么提前十多天就返回北京了呢？毛泽东的行动实在是太反常了。披星戴月，归心似箭，毛泽东每分每秒似乎都是掐算好了的。专列12日16时零5分抵达北京站，从来没有白天在北京站下车的毛泽东坐汽车回到中南海。对军事指挥员来说，战争中的时间往往是一件最出人意料武器。毛泽东命令李德生调一个师到南口待命。快到丰台，毛主席下令在丰台停车。

已经到了北京，毛泽东当然不着急了。他让汪东兴打电话给中办值班室，要他们通知李德生（北京军区司令员）、纪登奎（北京军区第三政委）、吴德（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忠（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到丰台车站等候（据张耀祠回忆，毛泽东是在天津站时叫他打的这个电话）。谈话后，毛泽东单独交给李德生一项任务，调38军一个师到南口待命。这里要特别说明，军队调动权集中在军委主席毛泽东那里，军委副主席林彪都不行，调动一个排也要经毛泽东批准。15时多，谈话结束，李德生立即赶回北京军区。

李德生调进北京的时间不长。1970年新总政成立，林彪提名在安徽“支左”立功的李德生（九大后被安排在国务院业务组、兼安徽省第一书记）当主任，毛泽东马上同意。

5月19日，林彪在毛家湾接见李德生和新总政班子，说调你来当总政主任，是我向主席建议的，我就是要叫丘八管秀才！就这样，李德生又进了军委办事组。

李德生传达了军委主席毛泽东的命令，同陈先瑞（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等军区领导研究调动部队进驻南口。南口在北京西北，再往前就是八达岭了，这是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向北就是张家口，既可防苏联入境，也可以平定北京城里的动乱。虽然包括李德生在内，这些高级将领们还是“不识庐山真面目”，但他们很快部署完毕。对即将发生的九一三事件来说，这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军事部署，说明毛泽东早已成竹在胸。果然，当天晚上发生了9 1 3事件。

在钓鱼台负责警卫工作的邬吉成（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回忆，9月12日晚上，中南海和钓鱼台都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22时左右，部队已经熄灯，邬吉成也睡了，汪东兴来电话，中南海已经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你负责布置钓鱼台的战备工作。战备到什么程度？汪东兴说，一等，把部队拉出来，布岗，设置路障，挖工事。邬吉成一头雾水，怎么回事，演习还是打仗？搞不清，命令如山倒，他马上增派岗哨，门口布上机枪，挖好了工事，设置钉板之类的路障，阻断了各楼之间的通路，到天亮才搞完。后来汪东兴再找邬吉成，找不到了，埋怨他紧急战备怎么到处乱跑？邬吉成说你不是叫我布置战备吗？紧急状态持续一个多星期，才自然平静下来，而战备结束则在一两个月之后。

这里有个疑问，为什么除了中南海，钓鱼台也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难道得知林立果一伙要攻打钓鱼台吗？

中央警卫团专门成立的机炮大队，一处设在钓鱼台，一处设在故宫。本来想把机枪和高炮架在西华门边的屏风楼上，但安装时发现根本弄不上去，只好算了。这不能不使人想起周宇驰（空军党办副主任）另一句歇斯底里的话，实在不行，我驾直升机去撞天安门。

据李伟信（上海空4军政治部副处长）供词，9月11日22时，得知毛泽东已经离沪北上。他们开会的房门打开着，李伟信到门口一看，室内气氛异样，刚才那种嚣张气焰已被神色茫然所代替。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空司一处处长）、于新野（空军司令部副处长）几个人目光滞呆，低头不语。林立果流着泪说，全完了，没完成首长（林彪）交给的重托，首长把生命交给了我，我拿什么去见首长？沉默了一阵，周宇驰抓起一个酒瓶子，狠命摔在地上，说难过也没用。还有一个办法，到国庆节那天，首长托病不去，老子他妈的驾直升机去撞天安门……我不得好死，他也别想好活！过一会儿周宇驰又说，还得去一个人伪装，代我撒传单，你们谁能跟我一块去？开始没人敢说话，在周宇驰催促下。于新野表示他去，接着我和刘沛丰也表示愿意去，林立果说，我不允许这样做。大家也觉得这种想法不现实，于新野自言自语，就怕等不到“十一”啦。

那是一个奇怪的夜晚，那个奇怪的夜晚是从9月12日下午开始的。1971年9月12日19时多，西郊机场响起三叉戟起飞的巨大轰鸣声，256号三叉戟秘密从北京飞往山海关机场。因为是临时，机组人员过了18时才接到训练飞行的通知。一切都显得那么神秘，但实际上对专机来说十分正常。因为专机需要保密，常借训练为由。

20时15分，机场调度室李海彬（西郊机场调度室主任，专门到北戴河负责专机）打电话给姜作寿（8341部队二大队大队长），说有个大飞机从北京来，是哪位首长？怎么也没有见你们来人接？天都黑了，还有谁来？李海彬急了，你们到底接不接？飞机15分钟后就落地了。接不接也不是姜作寿说了算，他说我了解一下。姜作寿打电话问李文普（林彪的警卫秘书），李文普回答得很干脆，我没有听说谁要来。姜问，那我们去不去车接？李文普说没有告诉你的事情，就不要管了。

三叉戟马上就到了，林彪别墅还一无所知，叶群（林彪妻子）为庆祝女儿林豆豆订婚，在

9 6 楼走廊放映香港电影《甜甜蜜蜜》，林办秘书、警卫员、服务员都被叫来了。文化大革命中只有孤零零的八个样板戏，哪里能看到香港爱情片？电影才放一半，值班秘书来问林豆豆，山海关机场来电话，说来了架飞机，问我们知不知道什么人来。林豆豆说不知道，但她想，可能是弟弟林立果回来了。

姜作寿放下电话才三四分钟，李文普的电话就追来了，急急地说，老虎（林立果）回来了，快派吉姆车去接。原来叶群从内部直线电话告诉李文普，立果听说豆豆今天订婚，很高兴，坐飞机赶回来祝贺。叶群要刘吉纯（8 3 4 1 部队警卫科副科长）坐车去接。姜作寿正在向司机小宁交代任务，一架大型飞机轰轰吼着，从西南向东北飞来。已经降低了高度，显然是要在山海关机场降落。小宁着急地说，接不到了，5 0 公里路，没有 4 0 分钟，怎么也开不到啊。姜作寿说，快动身吧，既然已经通知，接不到也要接。果然没接上。2 0 时 3 5 分，过秦皇岛不远，正急急忙忙赶路的司机小宁和刘吉纯发现一辆开着大灯的吉普车，目中无人般地“站”在马路中间，连忙停车，原来林立果“借”了机场的吉普车。刘吉纯和小宁表示歉意，林立果说不怨你们，事情急。说着，提着手提箱，换乘了吉姆车，扬长而去。

林立果为什么突然回到北戴河？因为南巡的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林立果连说糟糕，手忙脚乱给北戴河的叶群打电话，说两个小时后他飞往北戴河。

有一个事实似乎还没有人注意到，毛泽东秘密回到北京，除了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得到通知的就是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和周恩来。别人不可能知道，那么北戴河的叶群和北京的林立果是怎么知道的呢？是谁透露的？是“内线”？还是……圈套？

这大概是解开九一三事件之谜的一把钥匙。

空军学院东北角有两幢编号 1 3 和 1 4 的两层小楼，原是院领导的住宅，所以称将军楼。1 9 7 1 年 4 月底，这里成了林立果的“秘密据点”。9 月 1 2 日，是个星期天，空军学院停水停电。上午 1 0 时左右，负责后勤的老王接到电话，让他给将军楼送些开水和冷水。老王骑三轮跑了两趟，送去一大桶凉水和七八瓶开水，放在门口。转身要走，楼门开了，陈伦和（空军司办外事处秘书）叫住他，赶快准备 1 1 个人的午饭，三位首长的送到这里，另外八人到食堂吃，要争取 1 2 时 3 0 分吃上饭。这时已经是 1 2 时 1 0 分，哪里来得及？1 3 时多午饭好了，老王先给将军楼打了电话，把三个人的饭送到楼门口，交给等候在门口的三个女兵，然后带其他人去食堂吃饭。

1 5 时 1 0 分左右，将军楼车库开出一辆伏尔加，老王清楚地看见里面坐着三个人。司机是周宇驰，旁边是于新野，后座坐着林立果，一个个神情紧张……

从这段目击者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知道，1 5 时毛泽东还在丰台车站谈话时，已经有人把消息透露给了林立果。所以他急急忙忙到西郊机场策划“第二套方案”。1 6 时 3 0 分左右，胡萍（空军副参谋长、3 4 师党委书记）接到周宇驰安排南飞机群的电话，1 8 时刚过，2 5 6 机组接到飞往北戴河的命令。

得知毛泽东行踪的圈子非常小。如果不是毛泽东身边的人，他怎么可能知道？如果是毛泽东身边的人，九一三事件后马上就是一条大罪状，泄露毛泽东的绝密行动，尤其威胁到毛泽东的安全，怎么可能轻饶告密者？怎么可能让他逍遥法外？看来，这个电话非常蹊跷！

到底谁是告密者？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叶群说”，毛泽东回到北京，是汪东兴告诉她的。另一种是“民间说”，汪东兴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告诉了叶群。总之，北戴河的叶群先知

道，马上打电话通知林立果。虽然死无对证，要“抓”告密者也非常简单。查总机的话单就可以查到。到北戴河的电话是长途，总机需要登记话单，看看那段时间谁给叶群去过电话，一排查不就一目了然了吗？九一三事件后，军委一号台的话单仓库翻了个底朝天，一张一张地翻检过，并记录了从9月6日至12日他们之间的所有通话和通话时间，要找出“罪魁祸首”简直易如反掌。

如果是周恩来，为什么不追究？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的地位岌岌可危，四人帮一直想拔掉这颗“眼中钉”。把毛泽东的绝密行动密告叶群，和林彪穿一条裤子，这是打倒他最有利的理由啊！如果是汪东兴，那就更有理由打倒了。众所周知，汪东兴是毛泽东的心腹，庐山会议他跳得那么高，却“轻松过关”？而他不但接受“教训”，又“贼”胆包天把毛泽东的秘密告诉叶群，吃里扒外，难道不该“千刀万剐”吗？

可是奇怪！不论是周恩来，还是汪东兴，都平安无事。为什么不追究泄密这件事？似乎有些说不过去。是不是与汪东兴在庐山会议上打而不倒一样，背后有着永远不能示人的秘密？看来似乎只有一种可能，故意泄密，就是要打草惊“蛇”，就是要让“北戴河”的“鸡”半夜飞起来。

在那些惊心动魄的日子里，毛泽东是否意识到危险正在步步紧逼呢？他为什么突然回到北京？事先知道吗？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央召开的成都地区座谈会成员时说，林彪他们搞反革命活动，谁个晓得？我就不知道嘛。这话他说过多次。是这样吗？九一三事件扑朔迷离，如果毛泽东对林立果的行踪了如指掌，为什么突然回到北京？

李德生和汪东兴在回忆录中都提到，毛泽东有察觉。汪东兴说，毛主席对林彪究竟何时察觉？察觉多深？后来也没向我们讲过。但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回到北京和林立果离开北京决不是巧合，毛泽东一定知道周恩来、汪东兴、李德生他们不知道的更多的“机密情报”，甚至有可能了解整个“阴谋”。

~~~~~

## 【史料辨析】

谁掌握了破解林案的钥匙？

• 史 学 •

随着香港卫视对林案的质疑节目的播出和“重审林彪罪案”和解放日报对舒云女士质疑林案文章的连载，党内、军内、国内、世界史学界、传媒界对林案的质疑，真是“甚嚣尘上”!!!

但是，官方面对这些来自全世界的质疑和挑战，为何一言不发？如此低调？！

凤凰卫视揭示了一个谜底：官方不掌握破解林案的钥匙、第一手材料和“王牌”。

当年，官方为了在全国人民面前摆脱，“林彪，这个毛的接班人，在一夜之间，变成谋害毛的刽子手”的被动局面，把手中所有的牌，都一古脑打了出去，以正视听。甚至不惜编造谎言，蒙骗世人。没想到纸包不住火。33年后，官方面对来自全世界“甚嚣尘上”的质疑声，落的个无牌可打的地步。

事实也正是如此。当年，第一个赶到现场的，不是我们的孙一先参赞，而是苏联人。到现

场次数最多的是苏联人。在现场时间最长的，也是苏联人。最要命的是从现场拿到“黑匣子”和大量物证还是苏联人!!! 时至今日，这么多第一手材料都在俄国人手里，而且没有向世人公布，其间暗藏多少玄机？还不得而知。可见破解林案的钥匙和王牌都在俄国人手里，而不在官方手里！真是被动至极!!! 如果现在官方贸然出来说三道四，俄国学者只要一来说话，打一两张小牌，官方就会十分被动！因此，面对甚嚣尘上的质疑，官方只能一言不发，还算是“以静制动”。

按理，林案已时过境迁33年了，前苏联也成为过眼烟云，揭露它的真相，对俄国人已没有任何利害关系。为何至今那个黑匣子还不解密呢？从利害关系犯罪学的角度分析，这些林案第一手证据的解密，对我国官方利害关系最大：林案真相直接关系到官方是否曾向全世界撒下一个弥天大谎？关系到官方在世界范围的“诚信力”！关系到毛晚年的一项重大罪恶和本来面目！因此，林案不解密，对我国官方最有利！那么，为何俄国会按我方的利益，压着林案的王牌，不出牌呢？！

四人帮以后，邓和江都多次去过俄国。就他们两人的性格和为人而论，不能想象他们二人在谈话中，会不涉及林案，这个敏感的话题。其间，我方是否和俄国有什么政治交易呢？！是否林案又会成为双方达成“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一个筹码呢？

是交易就会松动。我们总不能老是让人家揪着小辫子，老是让头上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剑，过日子。俄国也不会让手里的王牌烂在手里!!!

~~~~~

【各抒己见】

难得糊涂，呼唤清醒

——评朱学渊先生《一堆糊涂虫说林彪》

• 云 衡 •

一谈到历史人物大家的感受总是差异很大的，但这个问题又非常重要，不可回避，所以我们必须把个人的观点都摆出来让发展的历史和未来的人民去打分。我最大的感受是我们这代人受到的教育对每一个人的影响实在太深太深了，这也包括在国民党统治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准确的说这就是时代的烙印，超越是非常艰难的，但只有超越才可能有我们的良好未来，这是本人最核心的观点之一。最生动的例子就要算是俄罗斯现任总统普京了。他虽然当的是民主制度下的总统，也想重新做人，但他根本难以摆脱克格勃的作风。我们有些人还没有认识到重新做人的重要性，这才是最可怕的啊！

那么我们的时代烙印主要表现在哪里呢？那就是我们总是用“好人”和“坏蛋”这样简单的标准来评价那些风云一时的人物，因为我们就是在这样标准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我们常常忘记了历史环境的局限性、个人思想的变幻与发展以及更为重要的：人格的多重性和时代性。《走向共和》中李鸿章的一句台词说得好：“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道出了超越时代的艰难性。用个人不同的感受来评价历史人物，其结果就只能是永无休止的争论，于是历史不但不能成为我们的一面镜子，反而成了包袱，这是非常可悲的。要想改变这种困扰，就必须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淡化历史人物的当时行为，重点研究他们对后世社会的影响和教训，这才是我们所要关心的核心问题啊！至于林彪和毛泽东的关系到底怎样和我们有何相干呢？甚至林彪事件的细节对我们也没有什么意义。我们只要认清“林彪事件”对中国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影响就足够了。

我以前在文章中曾经明确指出，所谓“林彪事件”即“九一三事件”本质上不是“林彪事件”，而是“林立果事件”。我绝对不相信林彪的思想能够觉悟到策划“五七一工程”那样的地步，虽然他确实与毛泽东早有矛盾，但他不太可能下决心发动军事政变，况且他的部下谁敢配合呢？正是林立果代表了当时年轻一代的觉醒，这是不可否认的最重要历史事实。当然林立果当时确实还没有清醒到能够认清马列主义的罪恶影响问题，但即使他能够认识到那样的程度他也不会说出来的，因为他的兄弟们未必能够接受。当时打着马列的旗帜搞政变是唯一可行的选择，因为那是当时社会最容易接受的理念，马列旗帜就如同是中国的天皇一样神圣。

下面我们再来一一分析受“林彪事件”影响的那些人们到底是真糊涂、假糊涂还是装糊涂？首先我们要知道在凤凰卫视上做节目太清醒显然是不行的，否则谁敢播放呢？另外这些“皇亲国戚”最关心的不是应该怎样评价林彪的问题，也不是良心发现了，而是怎样维护自身的利益问题，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十分清醒的，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吴法宪将军夫人陈经圻女士：黄、吴、李、邱确实是毛泽东时代最不幸的高层人物。毛泽东何尝不知道“林彪反革命集团”是子虚乌有？否则依毛泽东的性格焉不将其碎尸万段？不制造一个“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案子毛泽东如何能够下得台阶来？我们不能指望陈女士具有民主派的观点，所以她还算是清醒的。

林豆豆（林立衡）：林立衡肯定是当年最糊涂的一个人了。如果她不是那样“大义灭亲”，中国的历史早就改写了。这使我想到了那些文革初期勇于同自己家长划清界限的孩子们。那是怎样的一种黑暗时代啊？当然后悔药也买不到了，她这辈子只能在痛苦的回忆中煎熬了。不管她现在是不是清醒了，我们还是可怜可怜她吧！我真心希望她对自己的过去能够有所解脱。

周恩来：周恩来在“林彪事件”后大哭一场的确说明他才是当时最清醒的人。他倒不是为林彪的死而悲痛，当然多年的战友也不能不说有些感情，他实际上是当时真正认识到了江山将倾，毛家王朝从此将走向衰落的人。周恩来与毛泽东是狼狈为奸、互相依存的关系，他自然会为自己的“一世英名”即将付诸东流而万分悲痛了。

王光美和刘爱琴：她们说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我是百分之百的相信的，她们哪有那个胆子呢？也许她们现在也不敢公开反对，但并不能证明她们心里不恨毛，除非她们根本就不爱刘少奇。

前国家主席杨尚昆之子杨绍明：杨绍明是不是迫于压力说出那番话的就很难说了，他毕竟还要过日子啊！当然他对中国的命运无足轻重，他的话我们只管当作做戏算了。

即使从现在的观点来看《五七一工程纪要》也是具有重大进步意义的，毛泽东竟然敢于把这个东西向群众公布真是办了件他一生中最糊涂的事。不排除有人想借这个文件煽动人民对毛泽东的不满，只可惜当时的老百姓更加糊涂，少数清醒的人也不敢造次罢了。

我们认识历史人物一定不能够脱离当时的时代大背景，我们很多老民主战士当年不是也是一样糊涂的吗？过去糊涂是很自然的事，现在再糊涂就落伍了，我们也应该坚持进步不分先后，既往不咎的原则。其实毛泽东、蒋介石如果晚生几十年他们的思想也会与魏京生、王丹等一批人的思想差不多，而绝对不会产生毛泽东思想、蒋介石思想。认识了这个基本道理，我们还会去为他们的人格问题而大做文章吗？在黑暗年代里，每一个人的性格几乎都是扭曲的，在这一点上名人与普通人并没有天壤之别，过于苛刻的要求是不适当的，也会影响我们认识历史的精髓。我们只要清点一下他们留下的遗产就完全可以为他们的历史地位和功过是非下结论了！当

然要得到比较统一的结论也许还是需要一些时间的。

总之我认为对所谓“林彪事件”的讨论不是没有意义，而是意义重大，因为那是毛泽东从顶峰走向衰落的关键里程碑。但对我们来说“林彪事件”不是要翻案的问题，因为案子本身就是一个阴谋，而是要重新认识“五七一工程”的重要历史意义以及给我们所留下的经验教训。这和我们对于“六四”的态度应该完全一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毛泽东布下的陷阱中解脱出来，不再把注意力集中在林彪本人的一言一行上，而要重点分析“林彪事件”对唤醒民众所产生的巨大历史作用以及《五七一工程纪要》的进步性和前瞻性。

~~~~~

## 【史海钩沉】

### 周恩来与“反英抗暴斗争”

• 余长更 •

本世纪以来香港曾经发生过三次大动乱，这就是，1925年的省港大罢工、1941年底的日本入侵和领、1967年的左派工人大罢工。有趣的是，这三个事件各自相隔数十年，但是有两个人同这三次事件都有关系。这两个人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廖承志。二十年代的省港工人大罢工发生时，周恩来二十七岁，是中共广东区委的领导人之一，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他不仅参加了这次罢工的领导工作，而且在“沙基惨案”发生当天，亲自参加了游行，险些在英国军警枪弹下丧命。廖承志当时十七岁，是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活跃份子，参加了省港罢工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领香港时廖承志是中共香港工委的领导人，他奉周恩来之命，组织领导了大批左翼人士从香港向内地撤退。这两件事都是做得卓有成效的。1967年香港动乱发生时，周恩来已是中国的国务院总理，廖承志是国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兼“港澳组”组长。他们又一次地介入了香港的斗争。但是这场斗争却是虎头蛇尾，被动挨打，最后草草收兵。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被左翼称为“反英抗暴斗争”，而被右翼称为“香港暴乱”的那场动乱，是所谓“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产物，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究竟谁应当具体对这个事件负责，却仍然是个问题。中共官方把责任归到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身上，例如，曾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现在在美国的许家屯，根据从大陆官方了解到的情况写道：“‘反英抗暴’是四人帮利用香港工人的爱国情绪，试图改变中央对香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正确方针，使用暴力提前收回香港。这是四人帮控制的中央犯的错误，不是香港工人阶级犯的错误。”大陆上出版的一些书也是这样讲的。英国的麦克法夸尔和美国的费正清联合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一书则认为这场动乱的产生可能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中，外交部处于崩溃状态，外交大权实际上掌握在低级官员姚登山和红卫兵手里，周恩来不得不违心地默认在香港发生的革命行动。

许氏和《剑桥中国史》都说得不对。以江青为代表的“中央文革小组”通过宣传工具对香港的斗争发挥了很大影响，但在决策过程中，他们并没有插手。文化大革命中的外交部虽然也受到了冲击，但是他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之下，算是国务院系统中秩序最好的一个部，没有陷于瘫痪。中国驻外大使和驻外使馆一半以上的人员奉命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每个使馆的运动由该馆“革命群众”组成战斗队领导，使馆的领导干部都要接受群众的审查批判。姚登山当时自印尼回国，因为他在险恶的环境下领导使馆人员对印尼英勇斗争有功，回国后被任命为“红色外交战士”，在参加“五一节”游行观礼时，又被周恩来拉去同毛泽东夫妇照相，因而红极一时。但他又是使馆中的“当权派”，也要接受驻印尼使馆“战斗队”的审查批判。他当时不属于



外交部本部人员，同香港斗争毫无关系，所谓姚登山伙同红卫兵夺了外交大权，斗争了英国代办之类的说法纯属误传。香港动乱最初起源于当地群众的自发行动，后来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北京的外交部、国务院的领导人都负有责任。为了说明这一过程，首先要说明发生这场动乱的背景。

#### ◇ 造反夺权

文化大革命前，香港和澳门的工作是由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简称国务院外办）下的“港澳组”负责管理的，该组组长是廖承志，他直接领导设在香港的中共“港澳工委”。外办“港澳组”和“港澳工委”的成员多半是广东人。“港澳工委”的公开身份是新华社香港分社。“港澳工委”在广州有自己的机构，文化大革命前称为中共广东省委四处，起北京与香港之间中间环节的作用。由于香港、澳门分别处于英国和葡萄牙管辖之下，一些事务需要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外办“港澳组”不便出面，所以与英、葡官方的交涉由外交部负责，具体的承办机构是外交部西欧司，它是个办事机构，不参与港澳事务的决策。

文化大革命中情况发生了变化。1967年1月，爆发了革命造反派全国全面的夺权。当时外交部有一千五、六百人，而革命造反派只有一百人左右。然而夺权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召，全国各地各部门都一哄而起，外交部也不例外，于1月18日宣布夺权。当时，红卫兵在社会上到处乱窜，到处夺权。与其等红卫兵闯进外交部来夺权不如让外交部的造反派夺权，以免造成大乱，所以周恩来迅速召见外交部造反派，宣布支持他们的夺权。这样就把红卫兵挡在门外。周恩来的这个做法是成功的，外交部顺利地发生了造反夺权，没有造成混乱，外交工仍然能够正常进行。国务院外办的造反派人数更少，为了同样的原因，周恩来主动催促他们起来夺了权。同时，周宣布，中央机关的夺权仅限于夺取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对业务工作造反派只能行使监督权。由于周恩来对外交部革命造反派的支持，原来处于观望状态者也纷纷宣布参加革命造反派，造反派的队伍飞速扩大。文化大革命中，到处都出现了两派对立的群众组织，外交部却是一大派掌权。夺权以后的外交部出现了

两个系统：文化大革命运动由称为“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的革命造反派领导，外交工作则仍然由以陈毅为书记，姬鹏飞为副书记的中共外交部委员会（简称部党委）领导。陈毅是副总理，历来在中南海办公，不到外交部，外交部的常务副部长是姬鹏飞。此外还有多名副部长如：章汉夫、刘晓、罗贵波、乔冠华、王炳南、陈家康、韩念龙、徐以新、宦乡、龚澎、刘新权等。

（后三人是部长助理）副部长中，章汉夫因所谓“自首叛变”问题受中央专案审查，王炳南、陈家康则是经过周恩来、陈毅批准，由外交部党委定为重点批判的对象，主要批判他们的思想和工作作风问题。刘新权因为在北京外国语学院领导文化大革命期间，打击了学生，也处于受批判地位。刘晓不久出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继续在工作的部级领导有姬鹏飞、罗贵波、乔冠华、韩念龙、徐以新、宦乡、龚澎等人，文化大革命最初几年有这样多部领导还在工作的，是很少有的。部以下的司处两级中，一些正副司、处长因为这样那样的问题受批判、“靠边站”了，还有另一些正副司、处长在继续工作。整个业务系统保持不变。造反派在部、司两级成立“业务监督小组”来监督业务的进行。部监督小组人数不定，多时十来人，少时四、五人。司监督小组一般三、四人。所谓监督业务就是监督小组的代表同主管副部长或正、副司长一起共同研究和处理业务工作，共同签署文件。按照当时的不成文的规定，凡科长以上或支部书记以上的干部都是当权派，不得参加造反组织。凡是造反派都是一般干部，监督小组成员则是一般干部中对业务工作比较熟悉者。平日他们在司、处长领导下工作，现在他们同原先的上级领导平起平坐，共同处理问题，对业务工作取得了发言权。

夺权后四、五个月，外交部出现了与革命造反派对立的两个小组织，他们是保守派，因为人数不多，外交部一大派掌权的局面不变。

## ◇ 恶劣的先例

香港动乱是继中苏之间的“红场事件”和中国和印尼之间的尖锐斗争之后发生的，这两个事件给予香港的斗争以很大影响。

“红场事件”的情况是：69名留学英、法等的中国留学生，于1967年1月下旬途径莫斯科返国参加文化大革命。在莫斯科时，他们去红场向列宁、斯大林墓献花圈，而且在红场上朗读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毛泽东语录，受到在场的苏联军警的袭击，30多名学生受伤，其中4人伤势严重。外交部于1月26日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馆，对苏联军警打伤中国留学生的“血腥暴行”提出“最紧急最强烈的抗议”，照会还宣称：“苏联人民一定会起来造修正主义头子的反，罢他们的官，夺他们的权，粉碎修正统治。”这个用红卫兵式的语言写成的照会，是外交部东欧司起草，周恩来批准发出的。周不仅批发了这个照会，他还出人意外地以他的名义，打电报慰问在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转达“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对中国留学生的热烈问候。官方的《人民日报》社论竟然破口漫骂苏联领导人是肮脏的苏联修正主义猪猡。中方的挑衅引来了苏方对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袭击，双方斗争不断升级。二月初，周恩来批准了外交部提出的在北京和全国各大城市举行反苏示威游行的建议。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部署下，北京群众日以继夜地连续几天在苏联大使馆门外举行示威，使得苏联人一刻也不得安宁，参加示威的群众达到一百多万人，创下了北京游行示威的纪录。根据周恩来批准的外交部的建议，北京市革委会又召开了抗议苏联修正主义者“法西斯暴行”的十万人大会，周恩来、陈伯达等中国领导人出席。对于中方行动，苏方不断还击，双方你来我往，关系紧张。

中苏斗争高潮刚刚过去，中国与印尼的关系又因华侨问题爆发了冲突。4月已发展到互相袭击对方大使馆的程度。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临时代办姚登山领导使馆人员，抗击印尼军警袭击，被印尼政府驱逐出境，回国时受到热烈欢迎，被授以“红色外交战士”称号。外交部根据中苏斗争的规格，建议在北京举行群众示威和大会，反对印尼政府迫害华侨的暴行，周恩来又批准了外交部的建议，北京又举行了百万人示威，十万人大会。与此同时，中国与印度、蒙古等国都发生纠纷，群众的仇外排外情绪达到高峰。

在处理这些事件时，各级干部处于不同心态：造反夺权。在业务工作上取得了发言权的造反派，受极“左”思潮影响较大，他们倾向做出过份的反应；部、司长级干部并非头脑不清醒，但他们都害怕被人指为“右倾保守”，所以往往“宁左勿右”，随波逐流。廖承志因为处于挨批的地位而放弃了领导责任，陈毅因陷入所谓“二月逆流”而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受批评，成为外事系统群众组织的头号打倒对象，因而也难以发挥领导作用，责任完全落在周恩来身上。周曾经在一些具体的涉外事件上对红卫兵的过“左”行为有所节制，但是在对苏联和印尼的斗争问题上，他采纳了下面的建议，为以后的涉外斗争开创了恶劣的先例。

## ◇ 斗争初起

香港动乱就是在文化大革命这种特殊形势下发生的。1967年5月6日，九龙“新蒲岗人造塑胶花工厂”工人因劳资纠纷而罢工，与前来干预的警察发生冲突。当地左派立刻赋予这场纠纷以新的意义，纷纷前去慰问。香港警署拘捕了去向香港政府表示抗议的该厂工会主席和工人代表。香港左派人士声援工人，他们仿国内文化大革命的做法，手持毛泽东语录，列队走上街头，于11日去到港督府，进行抗议示威，他们要求港督出来接受他们的抗议，并在港督府墙上贴满了大字报。示威群众受到防暴警察的袭击，许多人受伤，一些人被捕。港澳工委认为，不能善罢甘休，必须坚持斗争。于是左派报纸大喊大叫，发动大量煽动性报导，中国银行把大喇叭安装在自己大厦的顶上，进行反对港英当局的广播。工委则继续组织群众去港督府抗

议，香港当局做好了准备，示威者上街后遭到防暴警察毒打，许多人被打伤，形势十分不利，“工委”主张以“硬”对“硬”，问题提到了北京。

北京舆论反应强烈。中央文革控制下的报纸热烈支持香港工人的斗争，热烈欢呼左派群众走上街头支援工人的行动，强烈抨击港英当局镇压群众“血腥暴行”。主管香港工作的国务院“港澳组”直到5月12日会同外交部，讨论这个问题。廖承志在中南海他的办公室内召集外办“港澳组”和外交部西欧司的联合会议，带领西欧司有关人员参加会议的是副部长罗贵波，外办和外交部“监督小组”的代表也参加了会议。

作为侨务工作系统头号被打倒的当权派，廖承志当时正藏在中南海内，躲避红卫兵和造反派纠缠。这次他主持会议，讨论的问题是：国内正在开展文化大革命，香港斗争起来了，在目前情况下，是收兵不搞，还是要搞？要搞，怎么搞？当时廖是红卫兵、造反派打击下的惊弓之鸟，已经失去了平日谈笑风生的态度，他没有发表肯定或否定的意见；但是可以看得出来，他同罗贵波等“当权派”对于文化大革命中在香港大搞一场，显然是有顾虑的，但是不肯明说。参加会议的一般干部调子较高，特别是外交部“监督小组”的代表，他认为当前形势的特点是帝、修、反联合反华，香港当局迫害华人，不是个局部性问题，而是帝、修、反联合反华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因此，支援香港斗争不但是大陆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且是粉碎帝、修、反联合反华阴谋所必需。对于这番道理，无人敢表示反对，于是大家同意，一定要粉碎港英当局的反华阴谋，坚决把这场斗争搞到底。会议决定由外交部出面发表声明，向英国提出抗议，并且通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组织群众性的抗议活动。外交部拟定了声明，除向英国政府提出“最紧急最强烈”的抗议外，还提出了下列要求：港英当局必须承认错误；严惩血腥镇压群众的主要责任者；要向被害群众赔礼道歉；要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按照中苏和中国—印尼斗争的规格，外交部建议从递交抗议照会之日起，组织一百万人在英国驻华代办处门前示威；举行一次十万人的群众大会，声援香港爱国同胞的斗争。这个报告（连同外交部声明）上报中央，得到周恩来批准。5月15日，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召见英国驻华代办，面交外交部声明。同日起，大批群众连续三天日夜在英国驻华代办处门前示威。5月18日，北京市委举行各界人士支援香港斗争的十万人大会。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出席了大会。由于副总理兼外长陈毅正在受批判，所以由副总理兼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谢富治发表讲话。除了谴责港英当局的“法西斯暴行”，重申外交部声明中的几条要求外，他又宣布，“香港同胞学习，宣传，运用和捍卫毛泽东思想是他们绝对的、神圣的、不侵犯的权利。香港英国当局没有任何权利干预。”一场小小的劳资冲突，演成了中英之间一场严重的斗争。

#### ◇ 骑虎难下

北京反映强烈，香港左派更加起劲。5月中旬以后，“工委”继续组织左翼工会工人和中资机构人员上街，去港督府抗议。港英当局寸步不让，坚持用防暴警察来对付示威者。外办“港澳组”和外交部连连接到报告说，香港防暴警察十分剽悍，打人凶狠，上街的群众赤手空拳，被打伤和遭逮捕的人与日俱增。一天夜间，香港新华分社通过北京总社向外交部报告，示威群众当天下午又遭防暴警察毒打，有一人被打死，多人被打伤。听到有人被港英警察打死，外交部立即向总理办公室报告，说香港打死了人。周恩来很快令秘书打电话向外交部查问，打死的是什么人，叫什么名字，在什么情况下和什么地方被打死等等。外交部回答不出，再向新华社查询，结果被告知是香港分社误报，当天下午示威者被严重打伤者不少，但是没有人被打死。外交部向周恩来报告查询结果，周批评说，情况都没有搞清楚就匆忙上报！次日，周恩来召集会议讨论香港“反英抗暴”斗争问题，出席会议的有陈毅、廖承志、罗贵波以及外办、外交部的有关人员，包括外交部部、司两级的“业务监督”。在会议上，廖承志就当时情况向周作了简短汇报。陈毅情绪低沉，在这次会议上没有认真发言。外交部和外办造反派代表终究同红卫兵不同，对周恩来十分尊重，在会上讲话的主要是周。

周的态度同官方声明、新闻媒介所唱的调子不同，对于香港左派上街示威游行，去港督府贴大字报等做法，他批评说，在香港这样的地方进行斗争，不能照搬国内文化大革命的一套，尤其是把大喇叭安在中国银行大楼上，简直是滑稽。他说，那里又不是我们内地，那样做不是故意向人家挑衅吗？人家怎么能够容忍呢？他命令立刻通知香港的人，把它拆掉。谈到示威者几次去港督府抗议和贴大字报，受到防暴警察伏击和毒打时，周说，要研究如何打胜这场斗争。他估计这件事一时完不了，说要专门成立一个班子对当地进行领导，这个班子主要由外办“港澳组”和外交部组成；但中央调查部、中央联络部、总参、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单位也要派人参加。这个机构设立在外交部，由廖承志负责，但是廖承志说他干不了，因为他出不了中南海，他一出中南海大门，“侨委”系统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就要把他揪去批斗。周叹气，廖建议罗贵波负责，罗主管西欧国家，对香港并无很多了解。周无奈，只得指定由罗负责。周指示，应尽快把班子建立起来，并立刻把“港澳工委”的人召到北京，讨论和拟定一个关于这场“反英抗暴”斗争的方案。

会后一两天，这个专门班子便建立起来了，它设在东交民巷（当时叫做反帝路）39号外交大楼（原来的“国际饭店”）二楼一排很隐蔽的办公室内，定名为外交部“港澳办公室”（简称港办），为了协助罗贵波，又调来外交部部长助理宦乡，他是有名的国际问题专家，曾任中国驻英国代办多年，对英国和香港情况都很熟悉。办公室内设政治、外交、新闻、联络、材料等组，人员以西欧司和外办“港澳组”为主，部司各有“监督小组”代表一人，调查部和人民日报各派有一人参加。中联部和总参没有派人来，也许是这两处当时正处于混乱之中。

5月25日左右，“工委”人员十来人到京，有的来自香港新华分社，有的来自广州“四处”，领队是分社的姓杨的秘书长。经过讨论后，双方总的意见是按照“一定要把这场斗争打胜”的精神来制订方案，具体办法是进一步发动群众，开展更大规模的罢工斗争来打击港英，直至取得胜利。“港办”和“工委”来京人员分工合作，前者负责制订这个方案的原则部份，后者负责制订具体斗争部份。“港办”拟定的方案，以实现5月25日外交部声明提出的几条要求为目标。讨论时，宦乡说，要求港英当局承认错误，严惩肇事者，对被害者赔礼道歉，保证永不再犯等等，等于是要求英国在这个问题上无条件投降，如果不对英施加“全面的综合性的压力”，是办不到的，但是在香港问题上有些事情我们却又不能做。他的意思是清楚的：以上述几项要求为目标不实际。当时讨论了可以从那些方面向港英施加压力。减少内地对香港的生活必需品（如食品、饮水）供应，以对港英施加压力，显然是不实际的，因为受害者主要是香港老百姓。有人提出可以在边境上或在大鹏湾采取一些行动，声援香港群众。罗贵波否定了这些意见，认为外交部不宜提出有关军事行动方面的建议。最后一致同意，以在香港发动群众同港英当局作斗争，为主要的斗争形式。与此同时，“工委”来人的方案也已拟定，两个方案合而为一，于5月28日上报中央。

5月30日，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他的会议室内召开会议，讨论外交部和“港澳工委”的方案，参加会议的有陈毅、廖承志、国务院外办人员、外交部“港办”和“港澳工委”人员共三、四十人。周恩来仔细看过放在他面前的与会者名单后，马上就批评“港澳工委”提出的一条建议。建议说，香港防暴警察打人凶狠，群众恨之入骨，“工委”要求中央批准他们在香港有选择地袭击几个警察站，杀他几个最坏的警官，以起杀一儆百之效。周恩来批评说，“什么‘杀一儆百’，简直是荒唐！共产党是搞政治斗争的，不搞暗杀。”“杀一儆百”之议被否定了。接着周开始审阅外交部和“工委”分别制订的方案。他边念边谈。方案第一段是讲香港这场斗争的意义，是当时的一些套话，周念过去了，没有评论。接着是讲这场“反英抗暴”斗争的目标，是要斗争取实现外交部5月15日声明中向英方提出的几条要求，他未置可否，就继续念下去了。方案列举了几条理由，来证明美国不会插手香港斗争，支持英国同中国对抗，其时中东正爆发战争，美帝无暇顾及香港。周说：“这倒是个

时机。”念到另一条理由，说香港对美国没有战略价值，周说，这条不对，香港是美国搞大陆情报的情报中心，对它很重要，怎么能说没有战略价值？外交部拟定的这部份方案主要是情况分析，不涉及什么实质性问题，周很快念过去了。

周恩来注意的是“工委”拟定的具体的斗争方案。“工委”人员进京之前并不知道要拟定什么斗争方案，直到他们到北京以后被告知，他们必须拟定一个计划，在香港发动群众起来斗争，直到迫使港英当局接受我方提出的条件为止。“工委”来人都是各级“当权派”，当时都处于受群众批判或审查的地位，他们都害怕别人说他们思想右倾，这样回去以后日子将更加难过。接受任务后，他们在招待所内关起门来，用一两天时间制订出一个计划，提出要通过三个回合的罢工斗争，打垮港英，迫使英国人接受中方的要求。第一个回合是发动八万到十万人的罢工，拟在6月10日左右开始。这一阶段的罢工将以交通运输工人为骨干，目的是使香港、九龙的各种交通停顿，使香港陷于瘫痪状态。如果港英当局仍不屈服，就发动第二阶段罢工，人数将扩大到三、四十万，甚至更多的人。最后，将发动香港、九龙、新界的总罢工，使整个香港陷于瘫痪。方案要求大陆给予罢工工人以强有力的支援，并深信这样一定会使港英当局屈膝投降。

周恩来对“工委”的罢工计划和乐观估计持怀疑态度，对香港左派工会的情况他显然是清楚的，这时他又详细询问了香港究竟能够动员多大力量投入斗争。“工委”的人七嘴八舌，含糊其辞。周摇头说，如果罢工的规模能够达到十万人到十五万人，那就很不错了。他不相信能够达到二、三十万人的规模。至于形成总罢工，使香港瘫痪，他认为更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在的情况同1925年省港大罢工时已有很大不同。接着他就同廖承志回顾起1925年的省港大罢工来。那时他们两人都在广州。香港有二十五万人参加反对英帝国主义的罢工，时间长达16个月，有20万工人回到广东省各地，从而使香港陷于瘫痪状态。周说，现在的情形不同了，港英当局很容易找到人来代替罢工的工人，罢工者不能像当年那样回到内地，香港经济已经同国际经济结成一体，要使它瘫痪、停顿，是不可能的。廖承志连连点头称是。谈话中，周忧心忡忡地几次提到，“搞不好，要搞出一个提前收回香港。”看来，周对这个方案并不满意。外交部“监督小组”代表提出，把方案拿回去修改后再报中央。周却出人意外地说，不用了，方案留在他那里，由他来修改，“工委”来人不要停留，马上回去，先按照方案所说的办。

次日，“工委”的人全都返回广州和香港。周恩来突然于6月初召见外交部“港办”人员。此时，“港办”得到《人民日报》一篇香港斗争的社论清样，社论的调子极其激烈，简直是一道号召香港居民，起来推翻英国统治的动员令。它的大标题是：《行动起来，粉碎港英的反动统治》，社论热烈赞扬香港爱国同胞反英抗暴的正义斗争，号召他们进一步行动起来，开展更大规模的斗争，充分发挥革命造反精神，“冲破一切禁令，打破一切条条框框”，在香港“大干一场”，要把港英的统治，“打个落花流水，打个稀里花啦”，社论最后号召，香港爱国同胞要作好准备，“随时响应祖国的号召，起来粉碎港英的反动统治”。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党的组织已经瘫痪，以毛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采取直接向群众转达命令的方式，这就是通过《人民日报》或“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社论，向人民发号施令。这篇社论给人的信息明白无误，中央下定了决心，在香港问题上要大干！甚至要结束英国在香港的统治！这与周恩来犹豫不决的态度显然是不同的。社论清样是《人民日报》记者带来的。

在中南海西华厅的会议室里，陈毅、李先念、廖承志等人已经先到。外交部“港办”人达到后，廖承志、罗贵波等人请陈毅先谈。陈毅说，他不用谈了，等一会儿总理要宣布决定，他会来说服造反派。这是什么意思？陈毅的意思显然是：上次会议以后，周对香港这场斗争有新的考虑，斗争或者是降温，或者是不搞了。周的意思同《人民日报》社论，为何相距如此之远？正猜测间，周进入会议室，“港办”的人把《人民日报》社论清样送给周，请他过目。周仔细地看了一遍，一言未发，此时他与秘书说了点什么，接着就宣布有事，当天的会议不开了，然后匆匆离去。周的突然宣布休会，是否同社论有关，不得而知。次日（6月3日），社论在《人民

日报》上发表，标题改得比较普通，不带号召性，内容有不少修改，那些尖锐的、激烈的、煽动性很强的句子删去了。周恩来事后说，他看到社论的清样后，立刻就找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说宣传上的调子可以比政府声明的调子高，但是也不能太高，陈对社论作了修改。

计划中第一阶段的大罢工在6月10日左右发动起来了，“港澳工委”领队下的左派工会都投入罢工，当地和内地报刊都大加渲染，交通运输、煤气等行业的工人一马当先，罢工开始时还显得有声有色。港英当局则通过各种办法破坏罢工，防暴警察殴打和逮捕罢工工人，香港局面发生混乱。斗争持续到6月底，英国方面仍然没有任何退让的迹象。按计划，斗争应当向着第二阶段发展，对港英施加更大压力，把罢工的规模扩大到二、三十万人。但是从前方传回北京的消息却是，现在不是扩大罢工规模的问题，而是现有规模也难以维持下去的问题，因为香港工人需要依靠工会资助能维持罢工，他们自己和家属都要生活。工会财力有限，资金很快告罄，“工委”要求内地提供资助，并以更多其他实际行动来支持罢工。财务上的支援由“工委”在广州解决了，但是5月28日北京的方案上并没有提出什么实际的支援行动。“港办”人员这时感到陷入了“骑虎难下”、“进退两难”的困境。

6月30日早晨，周恩来召见“港办”人员，一见面他就批评说：“香港斗争的计划总是不实际”，接着他谈到支援罢工的香港工人问题。他说，此事以民间机构出面为宜，广州军区（1月夺权后，广州实行了军事管制）本来打算成立一个民间性的“广东各界人士支援香港爱国同胞正义斗争委员会”（简称“支港委员会”）以便于向罢工提供资助，但是由于广州两派群众组织大闹派性，委员会组织不起来。他问外交部造反派，是否愿意组成一个小组，到广州去做当地造反派工作，说服他们同意把“支港委员会”成立起来。参加接见的造反派表示同意。又说：“当然，这场‘反英抗暴’斗争我们一定要打胜。”他命令就下一步怎么搞拟定一个新的方案，并且要求立刻动手。这次召见，陈毅和廖承志都没有露面，上次会议上陈毅所说的那些话，周这次只字未提。周恩来指定外办另一个副主任刘宁一参加会议后随即离去。与会者认为，周并没有说停止这场斗争，所以新方案的目标仍然是斗争取这场斗争的胜利。实现这个目的，迫使港英当局屈膝投降，大家建议采取更加激烈的措施。刘宁一听完讨论后，把提出的意见归纳为四句话，叫做：1，香港瘫痪；2，九龙大乱；3，陈兵边境；4，打破边界。方案按这四点内容写出后，于当天上报周恩来。

□ 原载《中国之春》1996年第3期

~~~~~

## 【往事如烟】

### 重庆文革口述史——黄廉访谈录（六）

• 老 田 •

（续上期）

#### 十一、陷入“安全困境”的造反派武装过程

7月底的时候，梁兴初和刘张他们到重庆制止武斗，他们走了问题也没有解决。形势越来越紧张，矛盾在持续积累和激化。反到底被打出来的人越来越多，许多人在重庆站不住脚，赶车跑去成都、宜宾、泸州等地，梁兴初还动不动就打电话来，要我去把人接回来。武斗已将我们逼得没有立锥之地了。

在二十一二号的时候，空压厂已经发了枪，机械学校的八一五也已经有枪了。体育馆已经

集中了许许多多的人，多数都是拖娃带崽的妇孺，其间我们的自卫力量还只有些钢钎，周围的八一五都有了枪支，如果住在文化宫的八一五专业武斗队一旦打来，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这个时候确实是由不得我了，必须考虑加强总部的自卫力量了，在一个中午的时候我集合了170多个拿钢钎的人，叫他们不要声张，跟我去建设厂要枪，听说他们正在发枪。我们不敢走大路去，说袁家岗的“机麻子”已经有枪了，封锁了三岔路口和大路，只有沿着江边的铁路分散运动过去。

我们好不容易到了建设厂，结果军工井冈山的人根本不买帐，不肯发枪给我们工人造反军总部。陈代富同志说：据说你搞上层路线，对武斗现状也不管，也不同意发枪，大家对你有意见。我说我给中央发了许多电报，中央也不表态，谢富治王力来了也不表态，刘结挺不表态，我有什么权力批准发枪。现在总部设在体育馆，只有二十来平方公里的地方，在那里住着的都是一些被各单位八一五打出来的避难者，万一被人家攻下来，拖娃带崽的多，怎么办？要给我们一点自卫的枪支，我们只要求有300条枪就行了。他们说是中学生逼着他们发枪的，我说要发枪也只能先武装成熟的工人，最好把枪掌握在本单位的复员转业军人手里，工人听话些，学生拿着枪隐患多。

周应古、陈代富、韩庆昌是建设厂的主要头，陈代富说我们要与周应古研究一下，总部是应该有武器，但是你思想右倾。周应古到重医去了，建设厂军工井冈山的头都在那里办公。我们到重医去找周应古，首先看到的是中学生大学生都在领枪，财贸921和交院915在那里领枪。有两个工人挎着枪，把我推到楼底下，声称要把我关起来，说是不要我去干扰他们，他们说八一五派八一兵团都已经发了枪。过了一阵子，重钢和杨家坪地区的造反军过来找周应古，说你们扣下黄老总。你周应古能够当好这个头？正在这个时候，五十四军的李凡处长过来了，邓长春的参谋小名周三的，拔枪顶住他，我要周三不要对李处长无礼，小心走火，结果又有两个造反军的人，拿枪顶住周三。发枪的隐患当场就看出来了，我对他们说，我们进行“文攻武卫”是被逼无奈，不是想要玩枪，要枪去参加解放军好了，拿着枪一定要加倍慎重。我当时心情万分沉重，文化大革命这一场斗争发展到今天，不知道最后究竟要付出多么高昂的代价。

有几个工人指责我不签字发枪，我对他们说，你们是工人出身，不是很懂政治，你手上已经有枪了，为什么还非要我老黄来签字？这不明摆着是一个圈套吗？我真签了字，你们就能拿到枪吗？这时重钢的几个荷枪实弹的造反军，站在我边上说：你们对老总如此无礼也不见得走得脱。周应古说，枪还没有组装出来，这些枪都是已经有主了。到晚饭的时候，去的同志非常不耐烦。周应古说枪可以发给你，但是你们今晚要参加总攻消灭“机麻子”，你们造反军的人，必须参加战斗，把天鹅宝蛋打下来，然后枪你们可以拿走。有些人是军队转业下来的，有些还当过连长什么的，他们说这个条件真的是很歹毒，这岂不是喊我们拿命换枪吗？要有命活下来，枪才能拿走，好吧，叫他们发枪，我们去跟他打仗。最后发给我们154支枪，每个人十匣子弹。

预备在当天晚上八点半发起总攻，大家都不愿意让我参战，四个人把住门口不让我出去。我说自己当过兵，还有点常识，最后他们同意我在后面的位置上督战，还给我换了一支最新的冲锋枪，四匣子弹，警卫脚跟脚傍着我。他们想要选择树林作为突破，我说还是选择红苕地比较好。正准备前进的时候，空压厂八一兵团开出四辆坦克，从清水池方向对建设厂进行猛烈攻击，我们就终止进攻，撤下来了又走不过去，我要他们赶快就地休息，准备应付今天晚上可能有的恶战。后来才听说，反到底用灭火器填装炸药炸坏了一辆坦克，就阻止了他们的进攻行为。看来双方都缺乏充分的作战准备，一旦出现意外情况，就不知所措。

第二天我们就将得到的一百多条枪拿回体育馆，我们仍然沿着江边的铁路回去，分成30个人一组，前面的走过去了没事，后面一组才敢跟上来，经菜园坝回到体育馆，这是我们第一

次得到枪。造反军内部也开始兼并，有一些想得到枪支的，就上黄山跟邓长春他们套近乎，接受收编。造反军南岸城建兵团的陈松柏同志，就坚持不肯接受收编，他坚持保卫海棠溪、上新街、黄角古道至黄角桠一线，在几次恶斗中间都有很好的表现，让老百姓的安宁不受侵犯。

武斗就这样升级了，反到底下面有些分团跟军工搞交易，木材厂、二轻各自去搞枪。在贯彻九五命令缴枪的时候，据说造反军缴枪数字是1000多条枪。武斗的枪支来源有二：一是抢解放军的枪，大部分是“明抢暗送”；二是军工厂里自己发的。两派都在抢枪，八一五实际上是明抢暗送，他们拿了枪就走，什么事情也没有，有同情反到底观点的战士，因制止八一五抢枪而受过处分；如反到底去抢枪是要付出了血的代价的，还有一次邓长春带人冲进军械库，发现里面都是些被服罐头，虽然什么武器都没有拿到，但是军队却借此告到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说反到底抢了军械库。

在重庆的军工厂中间，江陵厂是生产三七炮引信；长安厂生产三管、四管三七炮，解放前是生产冲锋枪的；空压厂生产坦克，通用机器厂生产装甲车；朝阳厂生产导弹，已经拿出来了，没有敢用；建设厂生产步兵枪支，控制在军工井冈山手里，这是反到底枪支来源的主渠道。生产枪支的技术很简单，据说江陵厂改装自己的机器也能生产枪支，八一五在井口农药机械厂，强行责令生产冲锋枪，并命名为“八一五”冲锋枪。武器就是这样大量地流向社会，大家各显神通。

至于弹药，江陵厂生产一些，子弹的主要生产厂是位于江南铜元局的长江电工厂，生产步枪和冲锋枪子弹，这个厂子当时控制在八一五手上，所以我们常常打到弹尽粮绝的困境，为了运弹药，我们江陵厂死了一些同志。

我曾想抵制武斗升级，也抵制不了。邓长春同志比我年青，他曾说黄枇杷不批我来批，他自己签字同意发枪。据说后来军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去侦察他当初写的那张字条，作为给他定罪的证据。后来很多人把武斗的责任推给江青，公正地看这是一个气候，谁都拿他无可奈何，武斗升级是逐步的、渐进的，不是哪个人能够控制得了的。有些人因为邓长春指挥过武斗，就把他说成是坏人，以此去苛责他，其实他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当时就算是邓长春本人不批准发枪，也会有别人去批准，要实行“武装自卫”的人不是一个两个，那是应付特定形势的一种方略，而不是哪个人凭空进行的创造发明。许多人没有亲自经历过那个时候，就想当然地下结论，也有许多人明明经历过了，却喜欢附合着后来的形势说些瞎话。我自己亲身经历过那个时期，我曾经竭力想要避免武斗，但是我最后还不得不亲自去寻求枪支来自卫，以增强安全感，所以我没有资格说瞎话。

## 十二、重庆大武斗

重庆武斗中间，场面宽，战场多，事件起因复杂，有许多事情我没有经历过，有些是当时听汇报的，知道多少说多少。

武汉720事件之后，成都军区张国华政委，打电话给我，要我去成都把反到底的人劝回来，我说根本就回不来，进得了重庆也回不了单位，不信你派人送回来试试就知道了。

当时我是尽量避免打，不主张主动进攻，也不是我们能够用武力打下来的。我当时写了《写给毛主席的汇报》，说他们把我们压缩在二十来平方公里的地域里，粮食和蔬菜断绝；因为他们有军队支持，要粮有粮，要枪有枪。而且还威胁要停水停电，我给五十四军打电话，说一经停水停电，几百万人的城市会发生什么后果，你们要考虑。



当时河运学校的航锋、军工的部分人、重钢也有人，集中在重医那一坨，成为反到底的一个据点，那里曾经发生过伤亡惨重的夜战。潘家坪高干招待所在八一五手里，两个据点，对面相望。他们从中江、泸州调来大批农民，准备夜袭重医，拔掉这个钉子，消灭住在重医的反到底那一坨。农民跟我们毫无瓜葛，谁能够动员他们，非常明显是拿得出钱和手上有权的人，八一五给农民发了枪，晚间参战人员穿上雨衣，匍匐通过招待所的花园和草地，准备去袭击重医。当时夜已经很深了，驻扎在重医的反到底又刚刚开完晚会休息了，外面没有人守卫。据说是有个师专的女学生，她带去的小妹妹不肯睡觉，跑到外面去玩枪，她先看到招待所花园里有很多猪，感到很奇怪，等到农民爬过来之后，她就看到刺刀的反光，她就用阵地上的机枪对准就打，这突然的开花当然就伤亡惨重，好在后坐力把她给掀翻了。枪声惊动了已经休息的人，大家跑上来就是一通好打，战后要找英雄，才知道是一个不肯睡觉的10多岁的小学女生，最先处置危险的。农民根本就没有受过训练，地形又不利，加上突然打响又不知道躲避，死伤非常惨重，有的说死了两百，有的说死了三百，过了几天尸体躺在果树下都腐烂了，结果是就地掩埋，有些农民死在那里很多年了，家里人恐怕都不知道他在哪里，到底是死是活。八一五后来又来报复，因为是白天，没有占到什么便宜。这类战乱中间的憾事，至今想起来还是心里难受，拿起武器实出于无奈，都是那些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走资派挑起内战，他们在一边渔利，这是我们的真正敌人，但是他们始终躲在一边。

我想起什么就谈什么，没有时序，武斗初期八一五为了打通往市区的道路，阳增太曾经指挥攻打响了工业学校一战，也是很有名的。建设厂的武斗，有重钢的造反军在那里支援，八一五在攻打建设厂的女工宿舍的时候，动用了火炮；为了拔掉压制建设厂火力点，建设厂举行反攻，赶走了占据“弯弯大楼”制高点的八一五。我虽然没有亲临武斗现场，在听到汇报之后，心情十分沉重。

重庆市市中区是夹在长江和嘉陵江之间的一个半岛，重庆出现割据局面之后，谁都是动弹不得。八一五已经控制了沙坪坝地区，断绝了西边的交通要道，在嘉陵江大桥南桥头六中占据着印刷厂和二轻大楼，封锁了反到底的大本营，火力封锁住嘉陵江大桥，断绝了北面的通道；东南面是长江，朝天门码头文革初期改称红港，很多据点被八一五占据了。我们总部设在体育馆附近，附近一带在我们手里；江北华新街到三钢、长安厂一线基本上是反到底控制，江陵厂也占了一片；依仗望江厂的实力，反到底控制了南岸和铜锣峡，从铁山坪翻过山去就与望江厂接壤。铜元局又控制在八一五手里。整个城市分割成为一片一片的，每一个地方都走不通了。当时只有军队的车辆可以畅通无阻，鉴于我们与军队的关系不好，军队不肯帮助我们运输生活用品，有时军队还故意刁难我们，不但是反到底大本营受困，其他工厂和附近地区的遭遇也一样，蔬菜粮食都无法运进来，我们总部就困在体育馆一带，各单位被打出来的反到底一派观点的群众，能够撤出来的就集中到体育馆来，容不下的，尽量劝他们远离重庆、出去投亲靠友。

当时反到底一派群众流亡到川内各地和全国，内战风烟滚滚的时候，重庆老百姓也和我们一样共同受苦。我们三面的交通都被断绝了，码头不能用，西边是重大控制的沙坪坝地域，嘉陵江大桥又被封锁，市中区的上百万老百姓也是被困住了，没有蔬菜供应。这个时候只能打通嘉陵江大桥，从江北运进粮食和蔬菜，斗争从大足、达县得到支援，这一道路上八一五只有几个孤立的据点。我们当时开会研究，粮食蔬菜已经没有了，如果八一五再断掉水电，那就更危险了，生存来源都断绝了，还谈什么“自卫”！我当时主持开会讨论，大家都认为封锁大桥的少数人，只有几百人，被困在体育馆的是多数，被困在市中区的老百姓是多数，反到底六大司令部和工总司都认为不能让上百万的老百姓饿死、困死！所以就与江北指挥部和长安厂“六月天兵”商量，预备打通大桥，从江北获得粮食和蔬菜，打下来之后立即由江北指挥部和长安厂把守大桥，维护交通。准许货运车辆进城，允许农民进城卖菜，允许普通群众自由过桥，加强检查，凡携带武器者不准通行，军车也要检查，不准帮助运送枪械和军火。

我们事先商定，在开炮之前要预先通知老百姓疏散，由江北指挥部的苏靖康和工总司的李木森同志做好炮手的思想工作，不要炮击民宅。同时也准备正告八一五武斗人员退出据点，还提前告知五十四军要他们帮助做八一五的工作，请他们自觉撤退，不要封锁嘉陵江大桥。当时也考虑到，有可能八一五得知进攻消息之后，调集大批力量过来，结果攻不下来。我当时讲，预先进行广播不是天真，而是事关人命，是对待群众的问题，八一五也是群众，如果他们要调重兵过来，那就打吧！具体的宣传工作、发布广播以及与军队通报，就由我来办。

8月14日下午五点钟，我给五十四军白斌副军长打电话，希望他做八一五的工作，白斌说一些官话，叫不要打，一切好商量。我告诉他说，你赶紧做工作，如果6点钟之前他们不撤除对嘉陵江大桥的封锁，我们就要开炮了。我把电话打完之后，由工总司、体委、长安厂的广播发出声明，各个点上都大开高音喇叭，说八一五围困市中区人民将近半个月了，我们没有粮食蔬菜，我们不得已要用武力逼退他们，请周围的群众理解并支持我们，尽快撤离。第二个广播是对八一五讲话的，说嘉陵江大桥是重庆人民的大桥，是重庆南北交流的要道，任何人任何团体都没有权利封锁，为了人民的生存，要求你们在一个小时之内撤出封锁据点，为了老百姓的利益，希望你们自觉放弃不恰当的做法。

广播之后，我就站在文联的楼顶上，八一五置之不理，附近的老百姓抱着东西、拖儿带女开始转移，情景非常感人。6点15分，江北区委和长安厂的炮位开始警告性的发炮，攻击八一五盘踞的轻工局大楼、六中和印刷厂，战斗大约进行了一小时四十分，也有的说是一个小时，因为是群众组织参战，没有那么一致。从后来查看的弹着点看，李木森和苏靖康同志是做了工作的，没有炮击任何一栋民宅，没有攻击一个非武斗据点，我由衷地佩服同志们。八一五的还击点定位在江北区委，长安厂，三钢。当时我身边的一个同志感叹说“这就是战场，好凶啊！”炮击准备过后，工人们都是赤膊上阵，穿了短裤，手持步枪和冲锋枪，在桥上匍匐前进，非常勇敢。打下来之后，我立即去江北区委指挥部，已经一个人都没有了，苏靖康他们已经精疲力竭去休息了，武斗人员也找不到了。在南桥头二轻局大楼被炮火击中，整个大楼起火燃烧了；六中的教室也被打坏了几间，印刷厂也有损失，市委大院也落了炮弹，八一五也有炮位设在市委背后。三钢死了几个人，当时只好埋在厂区，长安厂也有伤亡。大桥上有两具尸体，还是打着赤膊、躺在桥上。老百姓说还是反到底、工总司好，打仗之前就要我们避开，他们自己去牺牲，第二天尸体就腐败了，同志们就把他们安葬在桥头的花园里面。

第二天早上就听说农民的粮食和蔬菜已经进城了，大桥上的人成群结队，都是去江北的粮店买菜油的，粮店干脆每个人一瓶，发给大家。

这一仗打完之后，反到底士气大振，不少老百姓也认为反到底好，我们还出了很多布告，其间工总司也是很威风，街上的人看到我们，眼光中就充满着敬意。大家都是精神振奋，打下来之后要“表功”，造反军和工总司都有人教我打电话给中央汇报，长安厂的人估计说：恐怕打了五六千发炮弹，江北指挥部的人说他们也打了那么多，这样我就如实报告给北京，为什么要打，以及打了一万多发炮弹。小报以《嘉陵江上烟云滚滚》为题目加以报道，后来知道这个文章毛主席和周总理都看了。当时总共只有十七八门炮，炮击持续了一个来小时，估计打了三五千发炮弹是有的，没有上报的那么多，当初大家都是斗争着要表功。最后听说周总理骂败家子，大家又都缩回去了。

当时我们大开喇叭，提前警告准备进攻的时候，可能是五十四军不相信我们真能打；机关干部里面有些人说黄廉好傻呀，哪有打仗还提前告知对方的，也有的说是吓唬而已；周家喻后来告诉我，他当时也不相信你能打。经过这一件事，我对“兵不厌诈”有了很深刻的体会，事情常常是真真假假，难以辨别。

我们提前告知对方，最后还打赢了，都认为是个奇迹。我分析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是我们的炮多，他们只有几门炮；第二：据点里八一五派主要是一些学生，比我们这边工人更算是乌合之众，而且很多工人本身就是部队转业，有作战经验。打过之后，五十四军和旧市委的一些人就放出谣言来了，说反到底能够打下嘉陵江大桥，背后绝对有黑高参，说什么黄廉这个人从部队到地方都是要笔杆子的，哪里会打仗嘛。他们还说得有鼻子有眼，说黄廉曾经跟胡宗南的参谋长裴昌会一起下过棋，五十四军还说是裴昌会亲自帮黄廉确定的炮位。反到底内部本来就有分歧，接着这个怀疑又增加了，黄廉三十岁的人有这个能耐？还有的人觉得不应该把这个事情上报给北京，这也是一个分歧。后来那些当权派为了整我们，就着这个谣言，去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在清理阶级队伍中间为此还特别确立了个“一号专案”。这个专案是为了实现支一派压一派，为了把我们置于死地，一口咬定反到底和黄廉是被走资派、牛鬼蛇神和国民党旧军官所利用，除了要打击我本人和反到底一派的群众之外，这一专案不知道陷害了多少起义将领和群众。

根据我了解的实际情况，市公安局有个名叫高尚武的处长，曾经参加过“一号专案”的工作。专案的设想来自于五十四军军部保存了一个“联络图”，这是旧市委、革联会和五十四军早就构思好的，他们把一大批国民党起义将领和民主人士编入专案，说他们上面接受刘少奇邓小平的操纵，下面通过黄廉操纵造反军，在清队中间就按照事先准备好的联络图，进行逼供信以取得口供。具体是一个名叫邓翰的人，在苦打成招中间提供假材料，胡宗南的参谋长裴昌会被他们打断了脚杆，还涉及到夏仲实、鲁崇义等，还有一些低级别的国民党将领。这个图后来转移到公安局保管，高处长感到他们太不成话，完全没有一点共产党人的气味。高尚武同志出于良知和正义，含着泪水把一号专案联络图的复制件交给了我，我们拿到这个材料之后，作为一个走资派的政治阴谋，上报周总理和中央，说他们无中生有地对一派群众组织进行政治陷害，对民主人士进行陷害。在我几次挨整的时候，他们都要我交代如何知道这个材料，我怕他们杀人灭口就说案中有案，拒不回答，高处长后来还是遭他们排斥，无缘无故地靠边站了，这个案子决不是群众组织搞的，后来给一号专案平反的时候，鲁大东他们又另外编一套瞎话，掩盖自己和其他一些人在这个专案中间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掩盖他市如何利用这个专案来陷害与他有不同意见的老干部如王墨林、王公杰、王炎、宋学武、岳林等。我作为“一号专案”构陷的第一号对象，从来就没有平反。

1982年对我进行审判的时候，把打嘉陵江大桥的事情全部算在我头上，说我参加策划武斗，残害群众，犯有“反革命杀人伤人罪”。判决书列举的伤亡和损失数字是：“这次武斗造成打死十一人，打伤多人，烧毁重庆市第一轻工业局办公大楼、重庆第六中学一栋学生宿舍、嘉陵印刷厂厂房及部分设备，烧毁大楼干部档案、财会帐目、文件资料，后果严重。”由于他们在1979年已经给“一号专案”平了反，就不再说我跟国民党残渣余孽勾结搞叛乱了，改而说我们准备在重庆附近上山打游击。

### 十三、九五命令之后平息武斗的再次努力

在十六条中间就明确规定了“要文斗，不要武斗。”毛主席对后来的形势发展很有预见性，话说回来，文化大革命既然涉及到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又恰恰有发生武斗的理由。明明毛主席一贯是反对武斗的，武斗也是不受普通人欢迎的，许多参加者都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感觉。

我极力主张不要主动出击，只能自卫，自卫的时候眼看打得赢就打，不能自卫的就放弃单位，出去投亲靠友，那个时候成千上万的人赶火车去内江，去成都，反到底几十万人分布到四川各地去躲避武斗，改变了当地的力量对比。也有少数去了武汉，但是不多，有四个文艺团体在武汉为钢工总和空军演出，就留在那边几个月不回来。反到底内部就有人反对，说我是逃跑主义、右倾机会主义。

十多二十万人去成都，各个对口系统都住满了，个人去的没有人接待，饿得不行就在街上拿凉粉吃不给钱，梁兴初说你们的人到成都抢凉粉吃，给我弄回去；我说梁司令员，你连接待工作都作不了，这是你的耻辱，给他顶回去。我说回来过不了内江，到了荣昌也进不了重庆，回不了单位，他问有你说的怎么严重，我说你不信试一下。他们果然派人送了一批回来，结果在重庆站就遭到八一五殴打，一下火车就落入了八一五占领区，他们的安全就受到了威胁。

四川省革筹和成都军区向重庆派了武斗调查小组，还有制止武斗的工作组，周恩来也先后派来温伯华和谢文欣他们两个到重庆来，调查制止武斗，其间还有中央谢富治、王力和贵州的李再含也来过重庆。好多次把我们叫到五十四军去，做劝说工作。中央军委也派了一个名叫陈斌的中将，到重庆来制止武斗，组织了制止武斗的工作小组，我和周家喻都参加过，专门制作了制止武斗的旗帜，红边黄旗黑字，上面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警备区制止武斗小组”，制止武斗的汽车，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要放行，都说是“黄龙旗车子”来了。解决一些有名的武斗据点如杨家坪武斗、空压厂打清水池、沙坪坝、南岸、北碚等等，工总司都派人去看过，有些地方我也去看看，不是每个场合都去。那个时候重庆的武斗点比今天的伊拉克多几十倍，一打起来，双方都打电话说遭对方袭击，是非难分。

一次江南的铜元局发生了武斗，在警备区指示下，工总司派出的制止武斗的工作人员名叫谭学逸，他是二轻墨水厂的一个干部，是工总司的一个联络员，他为人很正直，参加了武斗制止小组工作。这一次他随车去江南制止武斗，戴有警备区和革筹组的制止武斗袖章，吉普车插了黄龙旗，在过汽渡的时候，八一五不放行，军队个别人耍派性手腕，要他下车去招呼，本来应该八一五本派的人下去招呼，结果他被武斗人员用钢钎捅死了。谭是戴着军队工作人员的标志、在执行制止武斗任务过程中牺牲的，五十四军却连公道话都不说，派性太严重，尸体运回军部之后就要我们去领走。他夫人是个医生，当她受到这个打击之后神经失常了，谭留下一个小女儿，到底是怎么长大的我都不清楚。

中央九五命令下达之后，温伯华找我谈话，说总理希望你起个好的作用，能不能说服你们工总司和造反军带个头。他还说我也跟总理说过你的处境，也很为难。白斌插话说，军工对黄廉是有意见，有人甚至说他是叛徒，他能说服吗？温伯华说，不管怎样，要相信中央，相信总理。刘结挺说，恐怕全国最后都要如此了，这个形势不能继续下去。我说，只要一放下武器，我们就是任人宰割了，一旦出现这个局面，我怎么对得起群众，到那时我们的人不把我撕成几片才怪。张国华说再拖延下去性质就变了，至少你自己表明态度，不要管军工听不听，少数人的问题你就不要管了。

我回到总部之后，思想斗争很激烈，从重庆人民的利益和造反派的政治利益出发，我应该这样做，也应该冒这个险。去跟各个组织商量，走一个地方碰一次壁，二七工人造反团说：你这是把我们的命拿去，军工除了能与李木森谈几句话之外，根本就不让我去，真有点“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味道。我当时有一种感觉，认为军工的同志只是对我不服气而已，并不是要对抗中央的命令。也有一部分人找我研究形势，我说温伯华不会撒谎，是周总理的意见。最后我回到造反军，我是一把手，就履行一下职权，把造反军全部13个勤务员，都集中到文联开会，我说一定要交枪，时间也只有两三天了，省革筹和总理的联络员都是这个意见，在规定的时间内再不交枪，就要宣布为非法武装组织，当作国民党和土匪来处理。很多人流着眼泪讲，老总你一定要考虑清楚，这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我说如果离开了十六条，离开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没有了宗旨还拿着枪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乱打，那是不行的，山西的造反派、云南的炮派是我们的前车之鉴，我就冒这个险听毛主席的话，首先缴枪，我顺手把手枪摘下来卸下弹夹放在桌子上，全体勤务员都流了眼泪，说就听你的吧，看交枪之后是个什么后果。

我至今对老工人有很深厚的感情，他们确实是冒着生命危险带头交枪的。我叫朱正坤拿笔来登记，大家把自己的冲锋枪、手枪都放在桌子上。然后我就给张政委、温伯华和五十四军打电话，说工人造反军决定首先交枪，明天一早送过去。结果五十四军反而有些紧张，更多的是被动，军长和政委都说料定黄廉办不成这个事情。第二天我们造反军六辆卡车，敲锣打鼓地送枪到五十四军去。我们一交枪，军工的同志们也行动起来，内部一些激进的同志恨我的情绪就更加上升了。

有人带头就好办了，我去江北郊区的几个武斗连队，跟他们开会说要交枪，有人哭起来，觉得此后命运难测。最后还是说服他们在期限之内，把武器如数上交了。有人说，他拿到枪连一发子弹都没有打过，你当时纪律太严，一发子弹都没有打过，要求打几发，我同意了。到稻田里安排打靶，每人三发子弹，满足一下小孩子心态。第二天下起滂沱大雨，各个分部都来交枪，交枪持续了一天半。军工也去交枪，五十四军只是派一个人来登记，连避雨的地方都不提供，开水也没有一口。枪支在大操场堆积如山，机关枪一堆，步枪一堆，老三八式一堆。他们五十四军的心态就是那个样子，看到我们交枪反而像是不高兴了，白斌副军长表扬我说：黄廉，你这次又放卫星了，又出风头了，张政委和周总理都要表扬你，你知道吧。

下来温伯华跟我说，黄廉同志，你做得好，要相信毛主席、相信党，我郑重告诉你，我向总理汇报，总理说应该给你表扬，你这个头带得好；昨天我跟五十四军碰头，他们估计你做不通底下的工作。我说这是靠了毛主席的威望，温伯华说你这么想就对了。现在回忆起来，那时真是“有枪就是草头王”，那个混乱阵仗很多人没有见过，那个时候好在有毛主席在，没有毛主席谁招呼得住。

在省革筹的监督下8月20日曾经达成制止武斗的协议，保证伤员的正常治疗。我们是九月九日交枪的，在八号的警备区会议做了表态。反到底发表了告全市人民书，说坚决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保证立即把武器上交。交枪之后，我的主要事务就是做内部的思想稳定工作，有的说交对了，有的说交错了，局部地区还在发生问题，这里告急，那里告急，我本单位木材公司也告急，这就越发埋怨上交错了，整天就是忙于做这个工作。至今有人说我们当时是“抢先上交”，说的多么轻巧，好像交枪这样性命交关的事情，也可以投机取巧似的，这个人很清楚当时的情况，要作出并执行这样的步骤是何等为难！今天这个人也已经年过花甲了，还这么说，恐怕真是“生命不息、派性不止”了。

（未完待续）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a href="http://www.cnd.org/">http://www.cnd.org/</a>		

---